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生成逻辑与文明指向

吴炜琦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具体展开,回答了“城市为谁发展、怎样发展、依靠谁治理”等重大问题,其生成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锚定现代城市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实现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方式转型,走向“五位一体”协调发展道路,开拓出超越传统东西方城市文明形态的城市文明新图景,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与世界城市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人民城市理念;科学内涵;生成逻辑;文明指向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3.013

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理空间,是集合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大型聚居地,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城市治理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城市治理的思想精髓有机融合,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为谁发展、怎样发展、依靠谁治理”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城市文明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人民性内涵,开辟出一条注重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城市文明发展建设新路,为中国城市发展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城市为谁发展、怎样发

展、依靠谁治理”等重大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价值目标、发展路径与治理方式,形成了具有鲜明人民立场与时代特征的城市发展理论。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将“人民”规定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价值原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1]37},并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16}。这一论断将人民置于城市建设与治理的中心位置,鲜明回答了现代城市“为谁发展”的根本问题,实现了从以城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观转变。

收稿日期:2026-0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KS112)

作者简介:吴炜琦(2003—),男,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mail:865339676@qq.com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强调城市建设“为了人民”,即城市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规模扩张,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已经超越基本生存层面,呈现出高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这就要求城市建设在夯实物质基础的同时,还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岗位与创业空间,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补齐民生短板;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保护历史记忆,增强市民的精神归属感。通过这些系统性举措,真正让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中拥有更高水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对人民性的强调,并不仅仅停留于传统意义上的“重民”、“惠民”层面,更深刻体现在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系统性确认。人民既是城市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又是城市建设与治理的主体力量,更是衡量城市建设成效的“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1]8}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打破了传统城市治理中政府单向主导的模式。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上,城市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更要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实现自我价值,这正是人民城市理念超越传统城市发展观的核心所在。

(二)坚持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不仅重新规定了城市发展的价值目标,同时也重新理清了现代城市建设的基本逻辑,强调城市发展必须实现人与城市、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推动城市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与空间增值,转向更加注重宜居性、文化性与生态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1]159}城市建设不能只围绕资本增殖与空间

开发展开,还必须充分考虑城市内部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139-140}。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要求城市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发展建设“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1]156},要求城市发展建设更加注重精细化、科学化与人性化。他同时要求正确处理现代化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将其与城市宜居性直接挂钩,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1]100},视其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将其放置在城市更新运动中的优先位置,彰显了对市民精神生活的直接保障。保护历史遗迹同时又是与保护生态文明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3]210},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融入城市治理中去。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强调城市建设中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突破过往治理理念中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要求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城市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历史文脉、生态环境与人的生活体验为代价,而要在发展中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体现出以系统思维统筹把握现代城市建设规律的辩证智慧。

(三)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不仅重新回答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现代城市“依靠谁治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4]343}。在人民城市,人民是城市的建设者、治理者,也是城市建设与治理的享有者,人民的主体地位贯穿城市建设的始终。

“共建”强调城市建设必须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5]587}人民生活

在城市之中,对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需求具有最直接的感受。要在城市治理与建设中广泛吸纳群众意见,推动人民从城市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从城市总体规划的公众听证会到社区的居民议事会,从老旧小区改造的民意征集到智慧建设的用户反馈平台,人民群众的声音被纳入城市治理的全流程。只有充分尊重人民意愿,才能建设真正符合人民需要的城市。

“共治”强调现代城市治理必须突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模式,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与市民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1]151},强调治理重心下移,通过基层协商、社区自治等方式,推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6]269}。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既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也增强了市民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感。

“共享”则是指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城市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39}在城市治理格局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共享是目标。共享并非少数群体对城市发展成果的优先占有,而是强调全体市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共同受益、共同发展,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城市真正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美好生活的共同家园。通过共建共治实现共享,不仅让市民共享物质层面的发展成果,更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既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城市真正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

二、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言:“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朱文公文集·答或人》)即想要彻底探究事物的“理”,就是要知道事物为什么要这样,知道事物为何必然是这样。

理解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所以然”与“所当然”,才能理解其科学内涵,进而理解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究竟会指向怎样的文明。

(一)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哲学理念,为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同样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中的种种弊病。他们认为,城市作为生产力集中发展的空间,本应促进人的交往与能力提升,但在私有制下却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限制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列宁则进一步对城市功能与地位进行了概括,明确了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指出“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7]358}。毛泽东有关城市建设的论述中则已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思想,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8]1324}。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强调城市不应只是资本的容器,而应成为促进社会整体进步、服务人民幸福生活需要、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文明空间。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作为城市发展的主体与目的,视城市为生命体与有机体,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一脉相承。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系列论述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与人文温度。《易经》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哲学自古便有“天人合一”的核心命题,从老庄、孔孟,到董仲舒、张载、王阳明,思想虽有多种表述和侧重点,但其核心精神是相通的,即坚持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指出:“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6]421},深刻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理念,强调城市建设不是要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是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123}的愿景则反映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诗意栖居的追求,于城市治理中融入人民

族特色,厚植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二者辩证结合,共同构成论述的理论基础,也回答了其“所以然”的关键问题。

(二)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我国城市发展从古代传统聚落治理,到近代城市化的探索,再到当代大规模城市化的奇迹与反思,层层积淀的历史经验与发展困境为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产生奠定了历史根基。“城市”一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彼时的城市二字,还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说文解字》中解释:“城,所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所谓城市,即城中之市,指的只是城墙范围内的市场区域。现代汉语中的城市是伴随时代发展的,在近代才有了它如今的内涵。但尽管现代“城市”概念尚未形成,古代中国依旧发展出超越单纯的“城中之市”范畴的聚落,并衍生了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治理理念。中国古代城市治理理念蕴含着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在规划布局上讲究整齐划一,在礼法约束下等级森严,呈现出传统哲学观念影响下一定程度的人文导向,但根本上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巩固。伴随封建王朝的落幕,中国传统学说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受到强烈冲击与质疑。中国古代城市治理理念作为其不完整的衍生品,很自然地在历史进程中走向了没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伴随工业化战略起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始终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城市发展道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城市性质的判断,党首先确立“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9]217-218}的判断,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利用资本与市场调动城市发展的活力,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也面临城市建设中从未有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旧城改造中历史文脉的断裂让我国城市建设陷入“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怪圈,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引发多种环境污染问题,生活成本的攀升与对公共服务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让人民幸福度下降、城市宜居程

度下降。“伴随城镇化下半场的到来,经济周期下行、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工业生产过剩、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叠加,传统动力模式难以为继。”^[10]新时代,我国城市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过往城市治理经验与治理方案失效的困境,亟须回答“城市为谁发展、怎样发展、依靠谁治理”问题。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既有自古以来城市建设经验的总结与积淀,同时包含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正是顺应历史趋势而生的产物,其诞生是我国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所以然”,更是历史演进的“所当然”。

(三)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城市发展、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更是脱胎于人民现实需要与国家战略需要的必然成果。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在城市领域具体表现为人民对城市生活中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多维度的需要。人民物质需要得到了基本满足,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稳定的收入增长、更优秀的基础设施,依旧是人民生活的重要追求。相较过去,人民不再满足于单纯享受城市发展建设带来的便利,同时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到城市的规划、管理和决策中去。在精神层面,人民追求城市不只是物质上的家园,更是精神上的家园,要求对城市文化、城市历史、城市特色、城市记忆的恰当保护。人民同时追求更和谐包容的社区关系、更加可感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的社保及教育医疗资源、更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法治,以及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生态层面,人民追求蓝天绿水、清新空气,向往更宜人、更自然、更优美的绿色家园,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城。人民对城市的追求不再是简单的聚居地,对城市的需要超越了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而人民对城市建设的主动追求恰恰构成了人民城市理念生成的直接动力。

正是在传统范式失灵、人民诉求升级、国家战略转型三者交汇的现实节点上,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应运而生,这既是对人民诉求

的回应,更是对城市发展新范式的构建。人民的主动追求构成论述建构的现实动力,国家的战略指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方向指引,传统范式的困境则构成了论述产生的现实紧迫性,三者共同搭建起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

三、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文明指向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立足中国城市发展实践,深度回应人类城市文明需求与困境,重新锚定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核心坐标,凝练出具备时代特征的城市文明发展理念,开拓了面向未来的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新前景,为世界城市文明发展指明方向。

(一)彰显现代城市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推动城市文明价值主体转变,明确城市发展的价值主体是人民,超越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指向了现代城市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度绑定,形成了“增长机器”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莫洛奇这样描述:“城市,对于那些有价值的人来说,是一台增长的机器。”……“地方经济增长是将生活质量和部分财富从当地普通民众转移到当地精英阶层。”^[11]在这种情况下,“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经济和生活质量上的负担”^[11]。该理论认为城市本质上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运转的机器,城市发展的价值主体被锁定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而政府则成为服务于这一小部分人增长诉求的工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在推动现代城市快速扩张的同时,却并未同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城市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社会问题却日益加剧。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则突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城市文明观,重新规定了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与价值归宿。其将城市发展的价值尺度从土地增值与资本回报转变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立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本价值坐标;同时将城市发展的价值主体从少数土地精英归还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一步实现了人民在城市文明中的主体地位重塑,强调

人民既是城市建设的受益者,也是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参与者、创造者。从少数资本与精英主导的文明形态,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明形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昭示“五位一体”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理念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指向了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方式的转型,塑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城市文明发展理念,实现了对过往城市文明形态的超越。

现代城市建设长期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发展理念:一种是形体主义的发展理念,强调功能分区,形体决定论与机械增长,将城市发展视作静态过程;另一种是人文主义的发展理念,更加重视人的生活体验、社区文化与城市精神价值,强调城市的人文关怀与公共属性,具有人本主义色彩。^[12]前者代表人物如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他主导的巴黎改造是现代城市规划的起点,一扫巴黎城中世纪的封闭与拥挤,将其转变为卫生、秩序、美学统一的现代首都。但另一方面,巴黎改造又采取了与过去完全割席的态度,严重破坏了巴黎的生态环境与历史建筑。当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这一过程形容为:“以前所未见的庞大规模来进行创造性的破坏。”^[13]¹²形体主义理念推动了城市快速扩张,却忽视人民真实生活需求,造成历史文脉断裂、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公共生活空间萎缩的问题。

人文主义城市观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则批判现代主义规划对城市生活的破坏,痛斥美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是对城市的洗劫,从低收入住宅区到奢华的住宅区,从文化中心到商业中心,无一不丧失了原有的生气,改建的成就却“比它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14]²,他强调街区活力、社区交往与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城市文明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城市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形体主义对“物”的过度迷恋,但其局限在于缺乏整体性发展视野,难以系统回应现代城市发展中的经济增长、社会治理与生态保护等复杂问题。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为根本框架,推动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对形体主义城市发展理念与人文主义城市发展理念的超越。其将城市视作生命体与有机体,城市发展必须统筹处理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在经济层面,论述强调城市发展必须从粗放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建设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政治层面,强调人民广泛参与城市治理,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层面,强调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与民族精神融入现代城市发展建设之中;在社会层面,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生态层面,则强调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城市生态文明形态。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系统塑造了兼顾物质发展、政治参与、精神文化、社会公平与生态和谐的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城市文明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

(三) 开辟“第三新文明”的人类现代城市文明发展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人类文明的多彩、平等与包容,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正是在辩证扬弃中汲取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精华,勾勒出现代城市文明的未来图景,也是人民城市理念的根本旨归。

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全球有识之士陷入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质疑之中。对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中华民族的传统老路和向西方学习之路。事实证明,前者难以为继,后者不可复制”^[15]。于是,一场围绕中西文化优劣之争及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路径的学术论战,于 1915 年的中国知识界爆发。在这一背景下,李大钊另辟蹊径,提出了“第三新文明”的主张。他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16]311}他认为需要在辩证扬弃中吸收东西文明的精华,超越折衷派对中西文明的

简单互补与融合,创造一种更高级的“第三新文明”。同时,李大钊又进一步判断说:“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6]311}他视十月革命为“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6]332},从十月革命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第三新文明”得以诞生的现实载体与实践力量,使“第三新文明”之说超越文化论战的范畴,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展现出强大的历史洞察力与革命先进性,为后世带来影响深远的启示。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最终指向正是城市语境下的“第三新文明”,其以马克思主义为黏合剂,在继承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人文导向与哲学智慧的同时,吸收了西方城市文明的科学理性与技术进步;针对当代全球城市化困境的时代回应,不仅追求单一城市的成功,更为全球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文明智慧,正是中华民族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底层逻辑,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扬弃的观念为指导思想,以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具体方法,以“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为设计蓝图,共同为整合东西方城市文明的美好愿景铺设了可行的实践路径,为全球城市文明贡献了一种兼顾理想与现实、传承与超越的“第三新文明”实践范式。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指向了一种面向未来、超越过往城市文明的新城市文明形态,即属于城市文明的“第三新文明”,昭示有别于过往文明形态的文明创造,指明了未来城市文明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国家战略需要,回应了我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历史与时代的共同选择。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将“人民”置于发展的起点与终点,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市民精神生活,促进城市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完善城市政治与社会治理制度,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层面丰富创新了城市文明理念,展示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背景下城市文明未来发展的崭新图景。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7]列宁. 列宁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郑德高,张亢,李鹏飞. 城市动力空间:从增长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型[J]. 城市规划学刊,2025(3):16-24.
- [11]哈维·莫罗奇,吴军,郭西. 城市作为增长机器:走向地方政治经济学[J]. 中国名城,2018(5):4-13.
- [12]董玛力,陈田,王丽艳.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J]. 人文地理,2009,24(5):42-46.
- [13]大卫·哈维.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 黄煜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4]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15]纪亚光. 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原点与追寻逻辑[J]. 思想战线,2023,49(5):30-38.
- [1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eople's city

WU Weiq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eople's city represent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o the field of urban governance, which address major issues including “for whom should cities develop, how should cities develop and who governs cities”, and its formation follows rigorous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Anchoring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benchmark of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eople's city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steer urban development toward coordinated progress under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forge a new landscape of urban civilization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Eastern and Western urban civilization forms, which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urb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e concept of people's city;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enerative logic;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周新颜)

引用格式 吴炜琦. 习近平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与文明指向[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6, 43(3): 99-105.

Wu Weiqi.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civilization orienta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eople's city[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3): 99-105.